

姜国柱 著

中国军事思想通史

③ 宋元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姜国柱 著

# 中国军事思想通史

③ 宋元卷



# 目 录

<b>第一章 北宋的军事思想</b> .....	(1)
第一节 北宋的社会军事概况 .....	(2)
第二节 许洞的军事思想 .....	(10)
第三节 《武经总要》的军事思想 .....	(34)
第四节 《行军须知》的军事思想 .....	(45)
第五节 《百战奇法》的军事思想 .....	(57)
第六节 王皙的军事思想 .....	(69)
第七节 梅尧臣的军事思想 .....	(85)
第八节 何氏的军事思想 .....	(101)
第九节 张预的军事思想 .....	(118)
第十节 郑友贤的军事思想 .....	(146)
第十一节 李觏的军事思想 .....	(159)
第十二节 苏洵的军事思想 .....	(183)
第十三节 曾巩的军事思想 .....	(204)
第十四节 张载的军事思想 .....	(214)
第十五节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 .....	(225)
第十六节 程颢、程颐的军事思想 .....	(241)
第十七节 苏轼的军事思想 .....	(269)
第十八节 苏辙的军事思想 .....	(294)
第十九节 何去非的军事思想 .....	(310)

<b>第二章 南宋的军事思想</b> .....	(330)
第一节 南宋的社会军事概况 .....	(331)
第二节 陈规的军事思想 .....	(334)
第三节 李纲的军事思想 .....	(341)
第四节 王彦的军事思想 .....	(351)
第五节 胡寅的军事思想 .....	(359)
第六节 胡宏的军事思想 .....	(374)
第七节 杨万里的军事思想 .....	(388)
第八节 朱熹的军事思想 .....	(408)
第九节 辛弃疾的军事思想 .....	(430)
第十节 陈亮的军事思想 .....	(456)
第十一节 叶适的军事思想 .....	(484)
第十二节 綦崇礼的军事思想 .....	(513)
第十三节 华岳的军事思想 .....	(526)
第十四节 文天祥的军事思想 .....	(546)
<b>第三章 元朝的军事思想</b> .....	(567)
第一节 元朝的社会军事概况 .....	(567)
第二节 铁木真的军事行略 .....	(572)
第三节 木华黎的军事行略 .....	(583)
第四节 史天泽的军事行略 .....	(587)
第五节 忽必烈的军事行略 .....	(591)
第六节 伯颜的军事行略 .....	(595)
<b>结 语</b> .....	(599)

# 第一章

## 北宋的军事思想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唐朝后期，宦官在中央弄权，藩镇在地方割据，整个封建统治腐败透顶，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和财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产生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宣公集》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的社会局面。广大劳苦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起义反抗，与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才是唯一生路。

农民武装起义，接连不断发生。尤其是王仙芝、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节度使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膨胀。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藩镇割据形势却更加严重，他们据地称雄，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成为新的割据势力。

同时，唐王朝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宦官和官僚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最后，大官僚崔胤勾结朱温进入长安，杀死宦官数百人。朱温于公元907年，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梁，史称为后梁。历时二百九十年的李唐王朝结束了，出现五代十国割据势力各自独立的政治局面，中国又由统一走向了分裂。

后梁建立后，山西藩镇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继续同后梁进行了争夺战争。公元923年，李存勖消灭后梁，建立后唐，逐渐统一了北方。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后晋灭亡后，它

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立后汉。后汉的天雄节度使郭威又灭后汉，建立后周。历史上把李唐王朝灭亡后，相继更迭的这五个朝代合称为“五代”。从公元907年到960年（赵匡胤灭后周，建立北宋），共五十四年。这五个朝代统治的地区，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与此同时，在南方先后存在过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和山西中部的北汉，总称为“十国”。

除了“五代十国”外，还有东北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北宋建国后，与辽国、西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战争状态，成为宋代的一个心腹大患。宋朝的“积贫积弱”，正在于此。

## 第一节 北宋的社会军事概况

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政权割据，在相互混战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之下，许多政权衰落、灭亡了。在这种形势下，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积极准备进行统一战争。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他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并让他的亲信大将赵匡胤挑选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人，编入禁军。

周世宗加强了经济力量和军事准备，便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先后攻占了后蜀和南唐所据诸州。公元959年，他又亲自统兵收复了辽朝侵占的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宁（河北青县）三州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北京附近）进军时，他却病死了。

周世宗死后，他的七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后周的实际大权则控制在统领禁军的大将赵匡胤手中。

柴宗训刚即位不久，就接到北汉和辽兵联合进攻的紧急边报。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一，正当后周君臣上下欢庆新年的时候，赵匡胤奉命统领军队去抵御辽和北汉的联军。当赵匡胤率兵走到开封东北的陈桥驿，他的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等人，出面发动兵变，并派人联络开封城里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做内应。他们把一件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他为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自称皇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

北宋建立之后，赵匡胤又经过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从而

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割据和纷争的战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封建中央统治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为了避免割据形势和分裂局面的再度出现，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统治，他与大臣们总结和吸取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武装割据，武将拥兵自立的教训，结合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统治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宋朝开国伊始，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为了解决“朝廷之权，散在四方”和“君弱臣强，正统数易”的突出矛盾，赵匡胤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削弱武装割据势力。据《宋史·职官志》七《府州监军》载：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

朝廷以二品以上文官，出守列郡，掌握兵权，总理州、郡等政治、军事要务，以此削弱武将的权力、势力，便于朝廷加强政治、军事统治。

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于中可见，宋朝开国执政者的政治、军事主旨。《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太祖建隆二年（961）载：“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

‘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说明。如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一中云：“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



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深明果断，天下无复太平之日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赵匡胤采纳了赵普之策，将其开国将领的军权削去，罢其军职，使军权集中到中央，军队听从皇帝指挥调动。与此同时，赵匡胤给这些削去军职、罢黜兵权的将领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让他们灯红酒绿、歌儿舞女相伴，饮食相欢，以终享天年。旨在防止将领们拥兵自重，造反夺权。

赵匡胤在收夺兵权的同时，又把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都收归中央。朱熹说：“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虜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一七八）赵匡胤深知自己用非法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不稳，生怕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便千方百计，采用各种手段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政权。他本人也是在惶恐忧惧中度过一生。邵伯温说：“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裯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邵氏闻见录》卷一）其所以战战兢兢，恐惧一生，正如王夫之所论：“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宋论》卷一）这是说，没有掌握重权，没有皇室的威望，没有学识的修养，没有民众的拥戴，不具备这些皇帝所必备的条件，所以很难维护其最高统治地位。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赵匡胤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赵匡胤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并不说明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的巩固，也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军事冲突的缓和。相反，却产生许多矛盾和带来种种困难，并潜伏着更多、更深的社会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赵宋王朝仍然陷入深深的困境。

在军事上，宋朝开国之初，即受到两大敌人的侵扰威胁：东北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公元936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而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使契丹大大增加了土地，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不久，契丹改国号为辽，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而时时威胁内地。公元959年，后周世宗举兵北伐，讨伐辽国，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宋初诸帝曾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之地，剪除辽敌这个大患，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宋太宗赵匡义于公元979、980、986年，三度御驾亲征，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北上伐辽的失败，宋王朝内部开始出现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不同政见。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步激化，这两种不同的政见逐步发展成为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直影响着整个宋朝，延续了近三百年。宋太宗以集中兵权防止藩镇割据为国策，使其对外作战与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他没有解决这个矛盾。以后的宋朝，转而对辽国采取守势，专力加强对国内的统治。宋太宗死后，宋真宗于公元1004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规定宋、辽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

由于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据《辽史·兵志下》记载：“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余多败衄，纵得亦不偿失。良田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无法拒敌。辽、金、元都因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威胁中原。辽之为患，由来已久。

与辽之为患的同时，西夏亦与宋朝为敌，为患甚大。“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土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

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辽史·兵志下》）西夏主赵元昊以甘肃之众、之地，进占宁夏乃至陕西等西北边境，“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所到之处，“焚荡庐舍，屠掠民畜”（《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惨祸不断，人民痛苦，不堪言说。起初，宋帝仅以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接着从公元1038—1048年，征战十年之久，耗尽民力、民财。宋朝屡屡失败，一败于延州（1040年，宋仁宗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二败于好水川（1041年，宋仁宗康定二年），三败于镇戎军（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虽在公元1044年，宋夏签订和约，宋王朝每年向西夏捐送各种礼物，如生日礼、岁银等，总计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但侵掠事件依然常常发生。时战时和持续多年，人民灾难，丝毫没有减轻。面对这种时局，少年张载“慨然以功名自许”（《行状》），“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张载传》），他学习兵法，决心解除边患。

宋朝与辽国、西夏这两大敌人交战、纳物，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宋朝步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

宋王朝之所以陷入窘境，步入颓势，是与赵匡胤所制定的国策密切相关的。他利用“杯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萃聚京师，削去兵权，赏以厚恩，使之富贵，以待天年。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冗官、冗吏、冗员，而且削弱了边塞的兵力，使边关吃紧，边陲受扰。由于宋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重内轻外、重文轻武、重中央轻地方的统治政策，既削弱了整个军事力量，又减弱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到了张载生活的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时代，则处于“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读史方輿纪要》卷十《直隶一》）的危险境地之中。

宋王朝规定三军统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属于枢密院，而枢密院则“无握兵之重”（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这种调兵权和领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和三军统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相互间的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年调动一次军队的

驻地。由于军队的不断调动,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且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和作战能力。

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范浚:《香溪集》卷四《五代论》)的拥兵持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代皇帝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指挥,装备精良,俸给优厚,驻守京师。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各地,各占一半,相互牵制。目的是防备军队造反,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此,宋神宗曾作了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引者注)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内外相制,谁也不敢有异心而谋反。

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内外相制等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然而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边境的防御力。他们一方面要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镇压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不得不采取利用与控制、使用与限制的统治权术,而不敢采取“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原则,这样就既不可能使军队建立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丧失的国土。

由于军事上的非策、失误,使赵宋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宋太宗赵匡义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在宋朝最高当权者看来,内患比外忧更可怕,因此他们着力于内患,而疏于外敌之患。结果招致对边境之敌的战斗一再失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宋初赵匡胤、赵匡义兄弟所制定的这些国策,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为止。

由于对辽国和西夏战争的失利,每年都要给辽国和西夏以巨款和绢帛,而大大地增加了国库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经济的危机。

尤其是军队的频繁征调，使军费开支剧增。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应付辽、西夏的侵扰，又加速扩军和增加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几乎增加了六倍，即由22万人，增加到近126万人。宋仁宗皇祐中（1050年左右），做过三司使的蔡襄，曾“较天下盈虚出入”，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过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支总额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对此，宋代不少学者都曾作过计算和说明。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用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者哉！今关内诸城，诚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以勇知。战以省兵，则每岁省费不啻二百余万，不逾数年，粟实财丰而不可胜用矣。不如是，恐财匮力殫，虏乘吾敝，将无从而制也。”（《文集佚存·边议》，《张载集》第358页）朱熹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蔡襄、张载、朱熹等都明确指出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然而却没有增加军队的战斗力。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严峻形势，宋代许多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为了解救国家之危，排除民族之患，挽救一旦之忧，而努力攻读兵书战策，深究历代兵法，揭发宋代军事积弊，故使宋代兵学大盛。

宋代兵学发展、兴盛，还与当权者的提倡、推广有关。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五月，神宗下令设立武学，对军事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令规定。元丰四年（1081），神宗下令国子监组织人力，精选、校理古代兵书战策，最后选定《孙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神宗钦定为《武经七书》，下令刊刻，颁为武学教材，从而使军事思想理论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权者的提倡、推行和学者们的精思、整理，而使宋代军事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

## 第二节 许洞的军事思想

许洞（976—1017），字洞天，又字渊夫，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

许洞父亲许仲容，以太子洗马而致仕。“洞性疏隽，幼时习弓矢击刺之伎，及长，折节励学，尤精《左氏传》。”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考中进士，为雄武军推官。“尝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当时马知节任知州，许洞移书指责马知节，“知节怒其狂狷不逊，会洞辄用公钱，奏除名”。许洞被除名后，归吴中故里数年，“日以酣饮为事。尝从民坊贯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数百言，乡人争往观，其酤数倍，乃尽捐洞所负”。许洞所居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吴人称之为许洞门前一竹竿。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许洞“献所撰《虎铃经》二十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以负谴报罢，就除均州参军”。大中祥符四年（1011），“祀汾阴，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主簿”。（以上引文均见《宋史·许洞传》）后坐事变姓名，隐居中条山。年四十二而卒。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许洞平生以文章自负，深通兵略。

许洞的主要军事著作作为《虎铃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虎铃经》为许洞“坐事变姓名，隐中条山”时所作，并云：

是书卷首有洞进表及自序。大意谓《孙子兵法》奥而精，学者难于晓用。李筌《太白阴符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乃演孙、李之要，而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以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相法，莫不具载。积四年书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铃经》。大都汇集前人之说，而参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载飞鸮、长虹、重覆、八卦四阵，及飞辕寨诸图，为洞自创耳。其四阵通论，自以为远胜李筌所纂，其间亦多迂阔诞渺之说，不足见诸施行。

可见《虎铃经》的内容驳杂，还包含着迷信的思想。近代有些学者，由于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影响，或者看到其中的某些迷信思想，则认为《虎铃经》是“书生论兵”，“缺乏实战经验”，不予重视。有的则断定其“实则是出自李筌而且比李筌更加迂阔荒诞而不切实际。后十卷全属兵阴阳之说，荒诞不经，扑朔迷离，没有什么军事学术价值”。因而加以否定，而对宋代开国以来出现的第一部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兵书的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评价不高。当然也就不可能认真研究，发掘其思想底蕴了。

关于《虎铃经》的写作意图、思想要旨，许洞在《虎铃经》的序中，作了明确的说明：

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

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铃经》。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至于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之相，得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自为一家之言。创意于辛丑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其书二百一十篇，分为二十卷。

《虎铃经》创意于辛丑之初，即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成文于甲辰之末，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许洞用了四年时间完成此书。其书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书中“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三才~~，~~万物~~，~~皆筌~~，~~皆~~具备，枝分派别，凡在师中吉者，必贯穿条~~缕~~，~~以~~《上虎铃经表》。前十卷主要论述天、地、人的三者关系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战争谋略，攻守形势，战阵之法等。后十卷主~~要~~讲~~讲~~阴阳、~~巧~~遁甲、风云、鸟情等。究其实，许洞“识韬略”

而懂“运筹决胜”之策。现就《虎铃经》一书，对许洞的军事思想，作具体论证。

### 一 三才应变，随用而胜

许洞言兵，“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并以天、地、人“三才”为主旨，而展开了他的军事思想的论证。“三才”之中，“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以此为道，则攻之必克，战之必胜。

关于“天”，许洞在《虎铃经》开宗明义第一篇《天功》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天道变化，消长万汇，契地之力，乃有成尔。天贵而地贱，天动而地静；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上有其动，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专也，知地之应天有常也。生机动则应之以生，气机动则应之以气。机正则泰，机乱则否。万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见之于地焉，岂止地之为乎？盖天道内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将者，地也。将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敌，地也。由此观其所动，故胜负可知矣。

天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万物消长，变化万千，同时要凭借地之力，天地配合，才能完成这种变化。天尊贵而地卑贱，天运动而地静止；贵者掌握运动变化的机制，贱者为取得成功而效力。天有其动，地有其化，天施动于地没有固定的模式，地之应天则有一定的规律。万物生长的时机到了，地就会使万物顺应气机而生，四时运转，顺应则吉，逆乱而凶。自然万物都有其自然形态，顺应与混乱，总是交替出现，交错发生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虽然见之于地，但却不是地所独有和主宰的。天道之内与地道之外，亦是交替出现的。王者为天，将者为地；将帅为天，士卒为地；我者为天，敌人为地。如果能以这种对立的矛盾关系来观察事物的运动变化之理，考察敌我的各种胜败之道，那么战争的胜负就可预知了。这就是由“天功”而建“王业”的道理。为此，许洞言兵，首言“天功”。

关于“地”，在言“天功”之后，紧接着就言“地利”。他在



《虎铃经》第二篇就言“地利”。他说：

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曰：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怠，用其谨慎，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以方位观之，则寒热之气异也。当有气之用，顺之者善矣。南方之气热，北方之气寒也。其气异，则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诸人而使之饮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风气，瘴疠之疾，冻涩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顺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气顺人，君能以人顺气，可也。是故利不可以专一，胡人之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师者不能择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所便也。冀其成功远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择利而从之，善矣。（《虎铃经·地利》）

地的形状、貌态，有险峻和平坦的不同；自然界的气候，有寒冷和炎热的差异。利用地形和气候，在于了解其逆与顺的不同。如果不认识、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必定不能得地之利。善于利用地利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能够化险要之地为平坦之地，化平坦之地为险要之地。否则，便不能得地之利，必然会引起军队的混乱，导致战争的失败。因此，对于地形险与易的利用，应当反其义而用之，即以险峻为平坦，以平坦为险峻，这样便可以得地利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地形的利用、得地形的便利而言，一般说来顺应地理自然气候是不错的。南方的气候炎热，北方的气候寒冷。气候冷热不同，人的水土习性自然也就不同。背逆人的生活习性去饮食、行军、作战，则会因为水土不服，南方湿热的疾病，北方寒冷的冻伤，都会加剧。用气候不适应的我军，进攻对气候很适应的敌军，能不招祸患吗？天时是不能使气候去适应人的要求的，但是君主则有权让人利用气候达到要求，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此说来，地利不能被某一方单独占有。如北方胡人善